

向歷史和現實的

實踐
筆記

嚴文生
夏春修
著

紅旗出版社

向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学习

——社会主义政治论集

滕文生 贾春峰

红旗出版社

封面题字：胡 绳

向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学习

滕文生 贾春峰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河北涿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85,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册

书号 3160·003 定价 0.70 元

目 录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
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	8
学好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	19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	28
坚持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38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在健康发展·····	47
努力实现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	54
关于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问题·····	63
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	74
权力不能过分集中·····	80
论党政分工·····	83
论加强安定团结·····	91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	102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108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119
要善于识别民主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观点·····	130
总结过去是为了指导今天和未来·····	146
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党的工作中的失误·····	152
“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列的某些论点加以误解或 教条化了·····	157

为什么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163
纠正“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坚持革命的旗帜·····	168
三中全会是历史的伟大转折·····	173
历史的经验揭示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177
论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勋·····	195
怎样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213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220
后记·····	227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自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年时间了。这场讨论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的根本问题。它是和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场讨论还有待于普遍、深入，但就其社会影响来说，超过了建国以来思想战线上任何一次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它是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讨论，一开始就以尖锐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承认不承认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承认不承认一切认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包括理论、方针、政策、决议、计划、报告、批示等等，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说，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还是坚持主观主义、一切从现成的本本甚至片言只语出发，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为什么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过程中，会发生这样一场震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大讨论？为什么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会发生根本的分歧？这不是偶然的。必须从十几年来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之间一直进行的实践论和天才论两种思想的斗争谈起。

十几年来，林彪、“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疯狂推行唯心主义的天才论。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望，

制造迷信。他们还采用摘引片言只语的手法，任意歪曲、肢解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变成了脱离革命实践的僵死的教条，又把这种教条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不准人们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人们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严重地陷入了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要彻底揭露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粉碎他们的帮派体系，而且要彻底清除他们宣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毒害，打碎他们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澄清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政策是非，使我们的理论、政策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使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获得真正解放。但是，正当运动逐步深入的时候，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它的特征，就是主张一切都从本本出发，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词句出发，认为只有书上写过的、领导人讲过的或者文件上提过的才算数，凡是过去写过的、讲过的，不管是否适合当时情况或后来条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不能稍许变动，一切都要照抄照搬。概括起来说就是这么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

这种倾向的存在和出现，严重地阻碍着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既然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当然也就不允许人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去冲破林彪、“四人帮”用种种借口（包括过去文件上写过的、领导人讲过的或画了圈的等等）设置的禁区，纠正被颠倒的各种是非，推倒一切冤、假、错案，谁这样做，谁就是触犯律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

显然，不克服这种倾向，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就难以实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障碍就不可能扫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无法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党的领导就有失去人民群众拥护

的危险。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千百万人民的实践，还是本本、片言只语和权力？这样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的讨论，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不可避免地展开了。

恩格斯曾经解释，为什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提出，会引起十九世纪哲学界和整个思想界的巨大震荡和深刻革命？他指出：“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者象列宁所说“理论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②同样是一个“很简单的原理”，或者象人们所说的是一个常识，但是，只要我们稍微考察一下这场讨论的情况就会立即发现，这个常识问题的重新提出，恰好从根本上打中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的要害。在这个简单原理面前，一切假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切过时的、错误的东西统统站不住了。正是因为这样，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能不使长期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思想领域和其他各个领域，发生强烈的反响和深刻的变化。

这场讨论具体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多，而最基本的分歧在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怎样才算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有的同志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怀疑和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砍旗”、“丢刀子”。这种责难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①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118页。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30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它的实质区别开来，善于把它的个别结论和科学体系区别开来，善于在各种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绝对不能动摇的。背离了，就会迷失方向。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它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指导革命。这种指导不是把理论当作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剪裁和宰割无限丰富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而是使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在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客观实际，形成方针、政策，反过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随着实践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公式和个别结论，由于不再适合新的历史条件而变得陈旧过时，必然要代之以新的公式和新的结论。一些个别的适合一定时期的口号或具体工作方针，当然更是如此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因为看到这种旧公式、旧结论的更新，旧口号、旧方针的改变，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产生怀疑和动摇；同样，当然也不会因为肯定这种更新和改变，而认为是什么“砍旗”、“丢刀子”，不管这种更新和改变同自己有什么样的切身关系。恰恰相反，这种更新和改变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无比生命力的表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不会也不可能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这种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动力和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有的同志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把理论摆到超乎实践的地位，否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十分尊重理论，十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他们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弄成象宗教教义那样的僵死的教条，因为只有宗教教义才自以为是受实践检验的东西，

只有“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马克思语），只有“虚伪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语），才害怕实践的检验。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不害怕和拒绝实践的检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称为毛泽东思想，正是由于它不拘泥于马列主义的个别旧结论，它使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受检验，并且用新鲜的经验去丰富它。如果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抱“照抄照搬”的态度，认为“句句是真理”，一句也不敢动，照搬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不敢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那就根本不会有毛泽东思想，也当然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样，如果列宁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也抱“照抄照搬”的态度，认为“句句是真理”，一句也不敢动，照搬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理论，不敢提出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新理论，那就根本不会有列宁主义，也当然不会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论是列宁还是毛泽东同志，都曾经遭到攻击，被说成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历史早已证明，真正坚持和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正是列宁和毛泽东，而不是那些口头上千百遍地叫喊“高举”，实际上毫无马列主义气味的人们。

有的同志还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会损害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种责难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坚持社会政治的安定，维护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赢得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切革命的人们，都应当十分珍惜这种政治局面，损害它，也就是损害现代化建设。但是，怎样实现和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呢？实践反复证明，要实现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必须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还必须依靠正确的思想路线。革命的团结要建立在同群众实践保持紧密联系的活生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离开这个基础，割断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群众实践的联系，囿于本本主义、片言只语的圈子里，不管情况和条件的变化，坚持旧的、过时的结论、口号，决定等，碰到千变万化的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准研究，那就形不成共同语言，因而也就不会有革命的团结。坚持这种错误倾向的人，必然要发展到搞小团体、小宗派的邪路上去。三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我们党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的经验时就指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①口头上的教条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盛行，正是导致“乱”的重要原因，必然造成破坏安定团结的派性活动的猖獗。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那些习惯于照抄照搬照转，热衷于本本主义的同志，不正是恰恰忘记和抛弃了这个真理吗？他们说是要维护安定团结，实际上却是在保存和培植不安定的因素。

事实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迎来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同坚持实践标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清理论上、政策上的大是大非，坚决平反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等等分不开的。不这样，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无从形成。我们还必须看到，林彪、“四人帮”破坏四项基本原则，“踢开党委闹革命”、搞派性分裂活动、制造和宣传现代迷信，以假“高举”骗人的流毒，并未完全肃清，这些是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加以克服。

两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说明，要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就必须彻底批判他们宣扬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这种批判决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分清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才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5页。

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消除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才能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我们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基本道理就在这里。

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

——读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是一九四四年三月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所作的报告。当时，我们党正在进行伟大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在发扬党内民主，解放思想的良好气氛中，大家通过学习历史文件，开展生动活泼的讨论和争论，对建党以来各个革命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地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使全党同志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空前地团结起来，为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准备了条件。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报告，是这次整风学习的产物。它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当前，我们党正在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全国人民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目的是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学习和消化自己的经验教训、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学习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报告，特别是学习报告中如何对历史事件、对历史实践中所发生的错误、所形成的正确的东西进行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无疑是很有教益的。

—

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尊重历史事实。

周恩来同志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指出：“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①他在通篇报告中始终贯穿了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按照历史实践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事物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无论是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八七”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还是对“六大”的总结，他都是把这些历史事件严格地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回顾它们发生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并联系当时的革命形势、阶级力量对比及党内状况，对它们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正因为这样，他对这些事件作出的有关结论，比如，他认为“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对于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对于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对于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等具体的实际问题缺乏认识，犯有原则性错误，^②就是“建立在它应当依据的唯一稳固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③因而，这些结论能够在当时为参加整风学习的党内高级干部所普遍接受，对消除党内在这些事件上的意见分歧，统一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直至今日，仍然显示出作为科学结论所具有的深刻性和正

①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57页。

②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页。

③ 《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312页。

确性。

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对待任何问题，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都是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总结历史经验、确定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的前提。是否忠实于历史事实，从事实出发，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问题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的一个根本的分水岭。所谓忠实于历史事实，从事实出发，就是对待历史进程、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不虚构一些联系放到历史事实中去，用虚构的联系代替它们本身的内在联系。只有这样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得出的应有的经验教训，它才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才经得起历史实践的考验，而不会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而丧失其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为群众所接受，成为动员和鼓舞他们继续前进的力量。相反，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如果从主观需要出发，从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好恶、情绪出发，脱离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甚至掩盖、歪曲历史事实，那么，这样总结出来的所谓经验教训，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就会混淆是非，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从而直接危害到现实的行动方针和前进的方向，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这一点，已经为以往的事实所反复证明。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着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旗号，大肆鼓吹什么“事实服从政治需要”、“材料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不是从有什么材料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对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以后的历史，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任意进行涂抹、歪曲、篡改和伪造，把一大批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打成所谓“民主派”、“走资派”，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为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目的服务。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记取。

二

总结历史经验，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实践中发生的错误，从中找出避免重犯这些错误的途径和办法。这在周恩来同志的这篇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生动的体现。

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事业。在实现这个伟大任务的艰巨复杂的斗争进程中，绝对不能设想不会经过极大的颠簸和曲折，不会经过多次尝试和反复实践的。作为这一事业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能力的局限，在具体领导革命事业前进的过程中，发生那样那样的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完全不犯错误的政党和领导人，在世界上一个也没有。犯错误对于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于已经发生的错误，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从中学到应当学到的东西。对待错误，可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采取不承认主义，或者寻找种种理由来回避、掩饰、开脱错误。第二种态度是被错误及其带来的困难所吓倒、所征服，丧失信心，陷入悲观主义。第三种态度是公开承认错误，认真揭露错误产生的原因，分析错误的性质和后果，仔细研究改正错误的方法。前两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都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只有第三种态度才是对待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是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重要标志。周恩来同志在这个报告中，对待党的历史错误就是始终采取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周恩来同志对“六大”和“六大”以前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错误，勇于正视，认真揭露，而毫不掩饰。报告中对南昌起义的总结，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明。南昌起义是我们党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六大”充分肯定了这一起义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了它

的错误。但是，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同志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根据“六大”以后新的实践经验和新的认识，在报告中对南昌起义的错误作了更深刻的解剖和分析。他说：“‘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①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同志正视错误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他无私无畏，严于解剖自己，对于工作中的错误，总是同全党同志和人民一道，反复地进行研究总结。他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光明磊落地以自己真实的面目出现于政治舞台，出现于广大群众之中。无论胜利的时刻，还是遭受挫折的时刻，他都是同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心心相连。正因为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林彪、“四人帮”如何向他倾泼污水，大肆攻击、诬陷，却丝毫无损于他在党内和人民中的光辉形象，而极端孤立的正是林彪、“四人帮”这伙反革命丑类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来说，敢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是一种有力量的表现，只会赢得人民更大的信赖和支持，而绝不会损失什么。用周恩来同志的话来说，就是：“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②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真理。

周恩来同志在研究“六大”和“六大”以前的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错误时，始终把注意力集中于分析错误发生的原因，错误的

①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3页。

② 《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1页。